

鄂伦春族原生态民俗信仰文化的阐释与反思

——解读大兴安岭地域作家诚然的长篇小说《白那恰》

王丙珍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 黑龙江省, 加格达奇, 165000)

摘要: 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项目《白那恰》是一部透视鄂伦春族生态文明的最新力作。小说以充满活力、神秘与想象的原始森林正在加速消亡为背景, 展现了人与自然生死相依的永恒状态。《白那恰》不是一个部落家族生存故事的单纯记忆与叙述, 而是整个鄂伦春族的生存史。透过作者对这个北方狩猎民族精神的了解与体悟, 小说呈现了鄂伦春族独特的民间风俗、信仰文化、生态智慧及其多舛的命运。

关键词: 鄂伦春族; 原生态民俗信仰; 生态文明; 平等对话

中图分类号: I2 **文献标识码:** A

长篇小说《白那恰》是大兴安岭地区本土作家诚然的最新力作, 同时也是一部全面展现鄂伦春族原生态文化的佳作。作者怀着对原生态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热爱, 把读者带进了鄂伦春人的原生态民俗信仰世界。小说刻画了鄂伦春族山神信仰的生态心理、图腾崇拜的生态意识、萨满信仰的生态禁律、火神信仰的生态自觉, 再现了鄂伦春族古朴的原生态文化内涵, 勾勒出这个北方狩猎民族的沧桑历史。《白那恰》将鄂伦春族原生态信仰文化当作人类的一面镜子, 生动地反映了鄂伦春族生态文明的若干侧面, 引导读者从鄂伦春族生态文明缩影中感悟人类史, 也为正处于生态环境恶化的当代人研究人类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这个永恒的课题提供了宝贵的文本与范例。《白那恰》既有历史的深度, 又有鄂伦春族集体意识的生态文明高度与生命价值观。鄂伦春族的狩猎生活与生产方式决定了其历史现实与传统文化延续, 所以, 《白那恰》的文学意义与社会价值正在于引起世人关注“小”民族的“大”生态文明理念。作者以深厚的民族情感与跨文化认同再现了鄂伦春人原生态文化与原始信仰习俗, 小说中的原生态民俗信仰文化既属于中国北方最古老的生态文明, 也是北方通古斯语族各民族共同的原生态生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结合文本细读与历时梳理, 分别从山神信仰的生态心理、图腾崇拜的生态意识、萨满信仰的生态禁律、火神信仰的生态自觉等四个层面, 阐释鄂伦春族原生态民俗信仰文化的自然观、生命观与哲学观。

一、山神信仰的生态理念

兴安岭原始的森林、富饶的河流与辽阔的草原是鄂伦春人天然的猎场, 为只有几千人的鄂伦春族提供了丰富的狩猎生活资源, 虽然他们的猎获量惊人, 但并未对大自然造成生态失衡, 这也是鄂伦春狩猎经济能延续到近代的重要因素。民族文化研究者对任何民族的研究都要关注其依附的生态环境, 研究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关系, 反之, 通过对一个民族原生态民俗信仰文化的研究, 也可以进一步了解民族文化的本质。由此, 生命系统、文化系统加上环境系统就构成了生态文化系统, 使得生物与非生物之间互相依赖与制约, 保持着一定的生态平衡关系。兴安岭恶劣的自然环境铸就鄂伦春人勇敢、刚强、自由、耐劳、敬

老、友爱、正直、朴素、尚武的民族精神。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鄂伦春族人口共计 8659,在漫长狩猎时代的早中期这个“小”民族形成并传承了的山神信仰,将“万物有灵论”引申为世界万物不仅有灵魂,而且万物也有其主宰的神灵,这种信仰意识理念是由每天与大自然直接接触的狩猎者生态思维的结果,并通过语言交流不断传播,逐步形成社会共同的意识与行为,正是个体体验与心理是原始哲学观产生的主要社会条件,也为以山神为基础的神话传说的产生打下了基础,反之,种种神话传说也为“白那恰”信仰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传媒作用,“白那恰”民俗信仰文化形式与神灵造型艺术表明鄂伦春人把大自然崇拜发展到以树木为主宰神实体的拟人化时代,这种信仰在北方的达斡尔族、鄂温克族中普遍存在,更有学者认定这一时期“为敖包民俗信仰文化的雏形期”。^[1]鄂伦春族中广泛流传着关于“白那查”狩猎神的传说,包含了对“白那恰”神的崇信社会心理。巴图宝音的《鄂伦春民间故事集》与峻林、国富、宝华编《鄂伦春民间故事集成》中都选入了《白那查的传说》,“这只老虎是就是白那查变的。森林里的白那查很怜悯弱小者、无能者和受人欺负的人。”^[2]这则关于山神的传说故事,代表了从事狩猎生产的鄂伦春族对大自然强大力量的依赖,渴望通过崇拜仪式求得山神庇护的社会心理需求。依据美国入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五大需求”,这种信仰的心理层次以生理需求与安全需求为根本,逐步过渡到社交需求的层次,达成天、地、人、神的交往与对话。

在鄂伦春语中,“白那恰”的含义很多,可以理解为山神、狩猎神、保护神、大地神等,鄂伦春人甚至将其当作幸运神与正义神。《白那恰》描述了 1 个部落、3 代首领、4 个家庭的生死沉沦,这个部落的 4 个家庭分别是莫日根一家 5 口、他的弟弟乌热松一家 3 口、他小女儿赵宝玉一家 3 口与白依尔托恩托元父子俩,从部落三代首领的苦苦挣扎到奋斗,到远去的生态环境与山神,到族人无处可去、直面灭亡,作者用日常生活的、片断的、诗意的、历史文档式的记录,实际上呈现的却是整个鄂伦春族的沧桑历史画卷,反映着现代鄂伦春族人民面临生态家园的日渐远去,又无力守望精神家园的困境,试图解答族人如何传承渐行渐远的狩猎文化与生态文明问题,让读者从中体会鄂伦春族日常生活中的生态文化。

小说中的第一代首领莫日根在各种天灾人祸中用祖上传下来的记事绳拴着民族的历史,他带领阿其格查部落逃离了可怕的天灾之地。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是脆弱的,也是智慧的,这种智慧表现在与自然的相依共存之中,表现在人类丰富的想象力中,在人类自身力量微弱、畏惧死亡的时候,人们创造了仙界与神灵,因此,鄂伦春族山神信仰的生态理念是有功利的、崇信的、敬畏的、成功的、感恩的与赞颂的。在新的生活居住地,人们在重建部落之前举行了祭拜山神的仪式,求白那恰保佑部落的人活下去,“面前的雕像是鲜活的,白那恰慈祥的目光看着他们,而且嘴似乎也在动,白那恰在抚慰着这些奔命的人。”^[3]

一切文明都离不开生态文化环境,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鄂伦春族原生态民俗信仰混杂着鄂伦春人在狩猎生产生活过程中学习的原始科学内涵,如原始天文、物候历法、民间医药、哲学意识、审美理念与生物知识等。鄂伦春族世代游猎于兴安岭中,森林与河流就是族人的精神与心灵家园,鄂伦春人爱生态环境强于农民热爱土地与农作物,因为他们完全把自己融于大自然之中,把自己视为大自然之子,生态环境也蕴含了鄂伦春人的原生态民俗信仰文化。“在我看来,鄂伦春人就是山神”,^[4]这是作者的肺腑之言,也是鄂伦春人的伟大之处,山神者保护山林者也。如今,鄂伦春人仍然崇信他们的“白那恰”,却在生态危机中承担了

现实处境的山神职责，守护着自己的家园，鄂伦春人永远都不是兴安岭的过客，他们是兴安岭真正的主人。

鄂伦春人与自身生存息息相关的自然万物和谐相处，山神信仰习俗是长期的游猎生活塑造的鄂伦春人独特的生态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源于鄂伦春人对于自然审美价值的需求，“自然与人之间是否构成审美价值关系，则取决于人是否具有审美心理。”^[5]否则，山神的艺术造型就不会是老年男人的形象。

二、图腾崇拜的生态意识

鄂伦春族历史表明游猎的鄂伦春人对自然界怀有的屈服、热爱与崇敬之心，族人多以河流的名字为生存之地命名，如额尔古纳河、甘河、诺敏河、托敏河、克一河、根河、古里河、多布库尔河、海拉尔河、呼玛河、盘古河、阿木尔河等，可见，生长于北方林海的鄂伦春人对山林河流的崇敬与热爱。解放前，鄂伦春族的各个氏族也总是在一定的森林河流范围之内活动，尽量不到其他氏族的生存范围内去，所以，解放后，鄂伦春下山定居也是以此为单位划分定居点的，至今，各个定居点的鄂伦春人之间不经常往来，以至于语言及生活习俗都有些许差异。

鄂伦春人传统狩猎生活只求温饱而已，并没有财产与商业的需求，因而也就没有过度猎杀动物的情况。鄂伦春人共同享用鹿、犴、野猪、熊等大动物的内脏，不能卖给外来人，他们相信如果卖给了他人，以后再也打不到猎物了，正因为没有功利追求才没有对大自然的无限掠夺与过度毁坏。在他们看来，自然生态构成了生命之所在，人只是被造之物。神秘的大兴安岭不是鄂伦春人抗争与征服的对象，而是恩赐鄂伦春族生命的源泉。这些带有原始思维特点的信仰观念，源自鄂伦春人对大自然的直接生存体悟：大自然不仅养育了我们，而且为我们的生命存在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与保障。同样，鄂伦春人认为动、植物也一样是自然界的生命，族人在茫茫林海中求生存，动物既是他们的生命之源——日日可餐的食物、身上的衣物，又是崇拜的对象。

另一方面，为了生存又不能不猎杀动物，要么就得挨饿等死，于是，族人不得不克服信仰的顾虑，同时又在杀死动物的时候，表现出对动物应有的尊重，尽可能地解释或隐瞒杀害它的事实，并且试图安抚所杀动物的灵魂，深怕受到各种报复。在长期的狩猎活动中禁忌打熊猎虎，鄂伦春民间故事将生命图腾的熊崇拜与民族起源联系起来，由此，产生众多的生态禁忌与戒律；鄂伦春人称老虎为“乌塔其”，其原意“老爷子”或“太爷”是对老年男子的尊称，鄂伦春猎人过去对猛兽不能直接叫其名字，这种称呼本身有敬畏之意也有图腾的含义。在他们的生命意识中，食物即是生命，所以能够养活他们也能够保佑他们。猎人们在人类基本生存的前提下，从不过度猎取动物，其目的就是让动物能够在大自然繁殖下去，这样人类才能世代生活下去。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鄂伦春猎人忌讳乌鸦的叫声，认为乌鸦是不吉祥之物，听到的人会不走运，影响狩猎丰收，但他们却不因此见到乌鸦就打杀，只是尽量避开罢了。这说明猎人在向自然界索取时，已经懂得了保护生态平衡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意义。由此，形成鄂伦春人图腾崇拜的基础与内涵。

我们正是据此看待莫日根的孙女吉诺养孢子这件事，这个狩猎民族如此珍爱生命，从她身上可折射出鄂伦春族的哲学观与生命观。在现代文明社会里，还有多少生命的价值被如此珍视过？后来，吉诺当选为氏族的首领，这样的叙述也许正是小说的“双重想象”，通过

对森林中的弱势群体或卑微者的地位变化，作者将历史循环论融入到复杂的语境之中，小说迫使读者不断地对人类历史进行思考与质疑，甚至是超越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时空。

大山的神灵即白那恰早已融入鄂伦春族的文化灵魂，象征着整个民族的荣辱兴衰，象征着鄂伦春族的前途与未来：

“河里的树木还在源源不断地从河的上游漂下来。不光是树木，偶尔还会有几张野兽的皮子和整张的桦树皮，还有仙人柱的木杆、铁克沙，还有桦皮盒，还有滑雪板，还有乌力安，还有包毫库特，还有奥仑，还有祖仙神像……”

让吉诺更加吃惊的是，她看见了那棵亲手刻画着的白那恰神像的大松树也漂在河里。

那棵树的根在前面，树梢在后面，白那恰神像就在水面上向天空仰着头，白那恰的脸上浸满了水珠，白那恰流泪了。

吉诺一下子跪在地上。

全乌力楞的人也都跟着跪在地上。

赵宝玉犹豫了一下，也跪下了。

有人问：‘塔坦达，咱们去哪？’

吉诺说：‘不知道。’

有人问：‘咱们去上游吗？’

吉诺说：‘上游没有树了。’

有人问：‘那就去下游。’

吉诺说：‘咱们是从那里来的！’

再没有人说话。

在河里，那棵雕着白那恰神像的大松树，悠悠地往下漂着、漂着，越来越模糊，越来越远……”^[6]

鄂伦春人失去了曾经的生态家园，雕刻有山神的大树也随之死去，只有心中的白那恰流浪在永远的精神家园……小说意味深长的结尾，并不只是简单的对一个民族命运感叹与浅薄的同情，而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发自情感深处的追问，给每个人以心灵上的震撼。最终，这个民族已无处可去，失去了民族赖以生存的生态家园，可以说《白那恰》的创作既是一种精神的创新，也是一种生态文化反思的呈现。

整篇小说演绎了一个鄂伦春族氏族在现代社会的苦苦挣扎，而且这演绎的过程是厚重而悲凉的，浸透着作者的深沉情感与思想张力。作者跳出了生活的原状，用自己的创造性思维绘制了一个艺术时空，以至作品既是一份现实的警示，更是一份审美的启示。作者意在拆解叙事，让民族的文化碎片融汇于日常生活的整体状态描写之中，并不是要复原现实生活，而是以有意味的形式去表达鄂伦春族文化与灵魂的东西，由此生发人性与历史交叉点。这是一种文学的神学，而是鄂伦春族的故事、鄂伦春族的精神乃至整个的民族史都属于小说的血肉。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说过：“在小说中，许多历史时代相互渗透，形成某种诗歌与梦的元历史。”^[7]从这种意义上说，《白那恰》刻画了鄂伦春族生存的挣扎与努力，揭示了鄂伦春族的文化苦旅。

三、萨满信仰的生态禁律

萨满文化是中国北方最古老的原始文明，是我国北方满一通古斯语族各民族的共同信

仰。萨满信仰既不属于巫术也不是迷信，而是一种原始的宗教，是人类童年时代的自然崇拜现象，萨满服上的动物与植物艺术造型验证了这一点，鄂伦春人将萨满视作人与神之间使者，实质上，萨满是氏族利益的代表者与保护者，是民族社会文化的集大成、代言人、传承者与创造者。

萨满是氏族的聪慧者、无私的奉献者、天才的舞者和歌者。正如《白那恰》中所描述的一样，萨满是这样神秘、执着、无私与高尚。萨满的责任是氏族的、公众的、集体的，一个人得了某种病，只能送信求助于萨满，除此别无生路，只有萨满的“通神术”才能治愈或减轻他的病。鄂伦春人认为，如果一个人的灵魂受到伤害或者迷失，就会导致生病或死亡，萨满通过连续不断的舞蹈和歌唱，达到一种无法控制的迷狂状态，从而用获得神性和法力挽救生命。因此，萨满的神歌就是生命之歌，可以抚平伤者的伤口，去除病者的疼痛，告慰亡者的魂灵，安抚失去家园的人们。

鄂伦春族信仰萨满，“萨满作为部落精神文化的代表，与一般的巫师相比，保持了宗教的庄严性，和人类童年时代文化传承人的质朴性。”^[8]小说中莫日根的大女儿乌拉仁银嘎就是流浪萨满，由于部落中没有萨满，莫日根的小女儿岳有华与孙女吉诺都学成氏族萨满，那些萨满仪式给处于绝境的人们一种精神的安慰与解脱，他们用学到的知识为整个氏族社会服务。大兴安岭地区白银纳鄂伦春民族乡萨满关扣尼讲过萨满起源的神话故事，她说萨满服上的铜铃飞向各处变成了许多萨满，她以艺术变形的审美形式叙述着民族信仰的记忆。

伴随着原始宗教信仰，鄂伦春人的狩猎生产方式有许多禁忌。鄂伦春人出猎期间禁忌告知他人打猎的地点和方向，因为野兽的肩骨孔有先知的本领，实际上，族人遵循的是对打猎领地的划分；鄂伦春族在打猎时，不能在狩猎经过的路上横放木棍，只能顺着路的方向放置，否则会不吉利，其实这也是对打猎区域的模糊认定；过去，鄂伦春人集体“打围”的目的在于猎取兽肉做食物储备，主要是猎取狍、犴、野猪等的“打菜围”，只是到了近现代，鄂伦春人与其他民族在商业交往中，才有以猎取熊胆、熊掌、鹿茸、鹿胎等为目的，用来交换生活用品或出售的“打红围”。此外，鄂伦春人还将动物的生长规律当作自然季节与狩猎历法，其中蕴含着自然崇拜的内涵，也是鄂伦春人传统的原生态民俗信仰的反映与延续。

小说也描述了鄂伦春人集体出猎时忌讳争吵和打架，而且不能争先向野兽开枪，否则不仅会吓跑野兽，而且使其他人不能专心致志地打猎。在同一区域生存下来的鄂伦春人，往往自发组成十几人的“乌力楞”即氏族组织，这种共同合作的地域关系超越了血缘关系，构成了基本的社会单位并将生存之地自然地规划为不同的界域。但是，不同区域生活的鄂伦春人也相互照应，如树上的“奥伦”即仓房是开放共用的，搬离时“斜仁住”即用树杆搭成的简易住处也不拆掉，而是等到下次再用或别的人家到此处居住时用，由此，每个氏族对其活动范围的山林就有了天然的责任并滋生出无限的热爱。

鄂伦春族萨满文化中人兽结合的神偶形象表明以人为本体的信仰文化的开始。当下透视这些艺术变化的形式，能够了解鄂伦春人对大自然的崇拜意识与行为并没有改变，从中我们仍能窥见人与自然密切相关而形成的生态文化本质与价值。

四、火神崇拜的生态自觉

鄂伦春人将火纳入他们的信仰范围之内，火对鄂伦春人而言即是生命之源，是民族生命的保障与象征，鄂伦春族称火为“透欧博如坎”即火神，族人普遍信仰火神的灵验。鄂伦春

族有关火神的传说中，火神是老年妇女的化身，教导族人要爱护火种。在火崇拜民俗信仰文化中又派生出了另一种民俗文化即篝火民俗文化，体现了鄂伦春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最终成为鄂伦春族生态民俗的组成部分，表现了鄂伦春人的生活观。“鄂伦春族在召开氏族大会时，首先要祭祀氏族祖先。在这种会场上也要燃起大堆篝火，火焰直冲云霄，标志氏族的兴旺发达。晚间进行跳舞等娱乐活动时，会场上的篝火燃烧得如同白昼。他们在问卜时，也离不开篝火。”^[9]

鄂伦春人对火的崇拜与信仰致使他们尊重火、祭祀火神、不滥用火，火成为鄂伦春族生态文明的意象，传承着鄂伦春人的生态自觉。小说深度阐释了火神崇拜的文化内涵，莫日根作为塔坦达即家族长，“塔坦”在鄂伦春语中是“火堆”的意思，一个家族首领就是一个管理好火堆不让其熄灭的人。父母为新婚的夫妇搭建好新的仙人柱即房子后，只有从家族的火堆中分出新的火种才算新家庭的正式建立，也正是火烧掉了阿其格查部落刚刚建立的家园，“这么大的山火，人没咋的，全靠神保佑啦！这回雷神、火神、风神都发火了，是怪罪咱们人和野兽呢，咱们又做错啥事了？”^[10]

鄂伦春人不断反思自己的生态作为，他们却是无罪的。只是到了民国以后，随着先进步枪的普遍使用以及其他民族的大量涌入，随之而来的还有对动物的大量猎杀，对森林的滥砍滥伐，人为火的泛滥成灾，众所周知，大兴安岭 1987 年的特大森林火灾就是人为之灾，从此，大兴安岭春秋两季的防火期禁止任何人员随便入山，但是，禁忌变成了禁止的效果却大打折扣、不容乐观，这也是“万亩林毁于一旦”的惨痛教训，这一切使得森林资源枯竭，使得兴安岭原始森林生态失衡，正应验了马克思恩格斯曾经的论说：“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1]鉴于此，承担生态破坏后果的却是兴安岭的原住民鄂伦春族，1996 年 1 月 23 日，鄂伦春自治区旗政府全面禁猎，猎民的枪支也由政府收上来统一保管，至此，鄂伦春族的狩猎文化已名存实亡。

针对兴安岭生态保护工程与维护这片大森林的生态效益，重点在于关照区域文化和内涵与特征，只有通过各民族生态文化的传承、阐释与创新，方能达成生态文化系统作为人类与宇宙和谐对话的生态文化智慧，正如美国解释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强调过的那样，只有地方性的知识才能解决地方性的问题，“同样，习俗差异形成了几乎无处不在的相当数量的民族分裂的基础，”^[12]最终，却如同古罗马对古希腊那样——征服者却被被征服者的文化所征服。对本民族而言，鄂伦春族原生态民俗信仰文化产生于狩猎时代的以崇拜大自然、寻求大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愿望为本质，促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火神民俗信仰行为、艺术、节日的形成与发展，为鄂伦春族的精神文化传承奠定了基础，塑就了鄂伦春族的生态文明，演变为族人代代相承的生态文化。

鄂伦春族民俗信仰文化是人与生态环境共处并以生态为本的生命文化，虽然已经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具有原始性的生态文化，却时刻影响着世界每一个民族的当下文化。《白那恰》呈现了鄂伦春族生态文化史，鄂伦春人强调对自然的敬畏，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尊重万物的生命，分担生态的职责，习惯于简朴的物质生活，在自然中感恩自然，所以，鄂伦春族是真正拥有生态体验与生态素养的民族。

五、结论

一部小说不足以达成一个民族的全部文化内质，也无法完全把握民族精神的实质，但是，

毕竟此文学作品呈现了一个“小少”民族的生态文化内涵，探讨了其生存之境与生态智慧。对一个文化研究学者而言，当他熟悉一种语言、一种民族文化行为的全部特有风格时，便会全身心地关注这一文化的完形，做得再好也有碍于真正的深入与理解，因为他必然要忠实于客观，不能掺入任何想象与情感。然而，对一个作家而言，正好弥补了这一不足。

毫无疑问，正是兴安岭特有的生态环境，孕育了鄂伦春族原始的狩猎生产生活方式，鄂伦春人充分保护与利用森林资源与野生动物资源形成了独特的狩猎文化，决定了他们的原生态思维方式及形态，形成了种种依赖大自然的原生态民俗信仰文化。今天鄂伦春族虽然离开了森林家园，被迫放弃了狩猎生产生活方式，具有原始特征的民俗信仰文化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但他们在漫长的狩猎时代所形成的民俗信仰文化及行为必将成为鄂伦春族新的民俗文化之根基。因为，“一种文化就像是一个人，是思想和行为的一个或多或少贯一的模式。每一种文化中都会形成一种并不必然是其他社会形态都有的独特的意图。在顺从这些意图时，每一部族都越来越加深了其经验。”^[13]鄂伦春族的原生态文化立足于现在、重构过去、启示未来，这也是生态实践记忆具有民族文化传播功能的特点。

总之，解读鄂伦春族信仰文化时，我们不能将这样的文化模式的任何一个细节忽略掉，相反，应该立足于当下，动态地把握一个民族文化的活态状态，结合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奠基的一般系统论研究，将鄂伦春族民俗信仰文化的每个要素定位生态文化系统的一定位置上，论述其起着的特定作用及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将生态环境与人的生存生活与文化活动联系在一起，将人与自然界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透视鄂伦春族的生态文明对人类未来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 [1] 鄂晓楠、鄂·苏日台：《原生态民俗信仰文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8页。
- [2] 巴图宝音：《鄂伦春民间故事集》，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4页。
- [3][4][6][10] 诚然：《白那恰》，重庆出版社，2012年，第14页，后记第Ⅱ页，第334-335页，第255页。
- [5] 黄秉生、王鼎生主编：《民族生态审美学》，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246页。
- [7] [捷]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余中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15页。
- [8] 孙曾田：《正在逝去的山神》，《人与生物圈》，2003年，第6期。
- [9] 赵复兴：《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的火文化》，《黑龙江民族丛刊》，1994年，第2期。
-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7页。
- [12]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312页。
- [13] [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炜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Explanation and reflection of the culture Oroqen's original ecological folk belief ——Interpretation of the novel *Bainaqia* of the local writer Cheng Ran in Daxinganling

WANG Bing-zhen

(Daxing'anling Vocational College, Jiagedaqi, Heilongjiang, 165000;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Abstract: *Bainaqla* is a new book on Oroqen'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hich is the key project of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to support. The novel shows the eternal state in life and death of man and nature, taking with the original forest which is accelerating the demise of vibrant, mystery and imaginary primary forest as the background. It is Oroqen's whole of the living history, which isn't the simple memory and narrative of the living story of a tribal family. The novel shows Oroqen's unique folk customs, religious culture, ecological wisdom and the changeable fate by the author's understanding and comprehens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northern hunting people.

Keywords: Oroqen; original ecological folk belie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qual dialogue

作者简介: 王丙珍 (1972-), 女, 汉族, 山东潍坊人,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副教授, 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美学专业 2009 级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文学与当代审美文化。

基金项目: 本文是 2011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鄂伦春族文学研究”(项目编号: 11YJC751072)。